

质性研究的形塑： 认识历程、价值选择与实践旨趣

王 霞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太原 030006)

【摘 要】质性研究不仅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蕴含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的方法论。通过对多种社会理论的批判与继承,质性研究的知识图景和研究规范得以形塑。在认识论的发展历程中,质性研究面对客观本质和非客观本质的不同本体论前提,先后形成了以发现、非理性参与、意向性获得和自我建构为核心的不同获知方式;在与社会运动和社会理论的密切联系中,质性研究表现出关注微观群体、注重个体体验、解构权威、追求解放的价值偏好;在实践层面,质性研究体现出经验取向、情境分析和建构实质理论的规范性旨趣。

【关键词】质性研究 认识历程 价值选择 实践旨趣

【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25)03-0190-15

质性研究是发轫于20世纪初期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较大发展,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领域,现已成为与实证研究并立的社会科学两大研究范式之一。陈向明对其作出了具体定义:“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真实的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的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探究,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从而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①质性研究以其灵活性、丰富性以及多样性等特点弥补了量化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冲击了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根深蒂固的一元化思想,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青睐。但是,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因认识不足而陷入研究误区,或是过度推崇研究的主观性,走向个体的精致主义;或是过于注重事实的描述和堆砌,走向逻辑和标准的失落。一种方法背后有其自身的知识论基础,它离不开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也会在社会语境中形成自己的价值偏好,更会在思维范式的影响下凸显独特的实践旨趣。正是这些不同的知识来源,形塑了质性研究的基本形态,也明确了质性研究的内在规范性。

收稿日期:2024-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国教育学研究方法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BAA230051)

^①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12页。

一、质性研究的认识历程

质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首先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即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认识本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原则是研究方法无法回避的理论来源和思想依据。克劳斯·海尔德(Klaus Held)曾谈道,哲学从一开始便是对真理的寻求,在处理现象与真理(本质)的关系上,西方哲学走出了三条不同的道路。^①第一条是古希腊先哲提出的抽象本质论,认为本质居于现象之先,人是被动的逻辑意义符号的承担者;第二条则以理性主义为代表,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强调人的逻辑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第三条以现象学为代表,坚信本质居于现象之中,是通过主体的意向性才能把握的意识成果,而非绝对客观的本质。本质及其认识的不同方式,为质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和认识路径。

(一) 客观本质的“客观”发现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开辟了近代主体主义道路,主体的“意识”被提升为存在的基质。“我”成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哲学由此正式进入认识论阶段。康德是这一认识论的典型代表。他提出认识活动是先验建构的重要观点,并沿袭了古希腊的传统,认为事实本身的存在与其显现是共属一体的。但是,存在本身是需要超越其显现方式的遮蔽性而凸显出来的,也就是说,现象和本质是两分的。为了保障认识的客观性,“物自体”成为现象背后本质把握的确证。这一逻辑进路表现为“人—现象—本质(物自体)”的渐次深化,“本质居于现象之后”成为近现代哲学认识论的重要依据。

如果相信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必然关系,那么重点就在于如何通过现象认识本质。人们探寻本质的方法有“形而上学”和实证研究两种范式。形而上学的思维将人类的经验秩序转向人类世界,是对万物有灵的神学逻辑的否定性超越。康德指出,人类需要依据先验范畴将杂多表象整合起来,并通过逻辑演绎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对本质的把握。^②人们在承认客观本质的同时,也默认了本质在于一种去掉遮蔽的“发现”。但是,这种纯粹思辨的主体是极致抽象而无法通达的,这就使得康德的认识论哲学顺其自然地导向了实证主义认知思维。实证主义最早由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提出,最初用以指代科学发展的历史理论的终结阶段。^③但19世纪晚期,它开始成为欧洲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致力于将所有的“形而上学”排除出去。后来,实证主义被改造为“逻辑经验主义”,并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庇护下,成为统一所有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思想传统。实证研究以量化研究为代表,旨在规避常识经验的不可靠性。一方面,实证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测量、统计等方法,以科学、准确、客观地揭示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为目标,成为人们“发现”本质与规律的可靠方

① 克劳斯·海尔德:《真理之争——哲学的起源与未来》,倪梁康译,《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

② 侯家英、白倩、李艺:《现象学视野中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讨论——以教育混合方法研究为例》,《电化教育研究》2023年第2期。

③ 约翰·扎米托:《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刘鹏译校,《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式。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强调研究者的客观身份,要求摒除研究主体的干扰因素。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指出的,旁观者的角色定位暗含着这样一种理解:“真理或实在都不是给定的,它们没有哪个是如其所是显现的,只有干预现象,废除现象,才有希望获得真知。”^①实证主义带来了科学主义的高潮,也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获得了接近真理的特权,这种影响逐渐蔓延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质性研究最早的出发点与实证主义“揭示—发现”的路径并无不同,其基本目的也在于“求真”。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承认世界是客观的,并且存在唯一的“真”,即事物的客观本质。受此影响,质性研究的产生表现出朴素的现实主义倾向,即不断接近和寻求社会科学的规律性、真理性认识。有所区别的是,量化的实证研究是通过研究对象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资料,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思维,形成对事物本质的客观化认识;质性研究则是依赖研究对象的经验及其解释,通过描述、分析和理解来实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尽管路径不同,但质性研究仍表现出以社会进化论为目标的实证主义取向。以民族志为代表的早期质性研究,就是通过田野研究获取研究对象的经验事实,并对这些经验事实进行归纳和分析,以发现社会科学中无法被证明或证实、需要描述和解释的客观规律。注重研究问题的客观性,秉持“求真”原则展开实地探索和经验收集,由此获取对社会现象的本质认识,成为质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二) 客观本质的“非理性参与”

尽管承认社会世界有内在本质,实证主义立足于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认识论还是受到了质疑。例如,方法的客观性是否代表着能够实现对本质的完全和科学认识?而且,是否存在绝对客观的方法?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后实证主义提出了相对主义立场和多元视角。这一理论仍然坚信事物存在客观本质,但也认为科学研究只能无限逼近现实,而永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任何研究都只是对部分现象进行“真实”的描述。因此,必须从多种角度和视野来审视现象,注重知识获得过程的情境性、主观性等因素。

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批判了实证主义对逻辑和客观性的承诺,提出了认识事物本质的内部视角,也即“观察负载理论”。他们认为,对本质的认识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的经验逻辑显现,任何经验方法都负载着一定的理论认知。“怎样才能够被视为一项观察,对观察术语的解释或者观察术语之意义确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理论依赖性’的。”^②社会现实是客观的,但也与自然法则一样,不能被完全理解,这是主体的认知局限导致的。波普尔在反归纳主义和经验证实的基础上倡导非理性主义科学观。他坚信理论先于观察,理论来自科学家的灵感,理论是

①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18页。

② 约翰·扎米托:《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大胆的猜测。^①

后实证主义试图阐明这样一种真相,即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是一种被修正过的客体,也是一种被限定的观念事物,而且只能是一种近似,甚至是一种“主体赋予”。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清楚地说明了主体赋予性的含义,他指出:“大多数社会行为或人类行为,都不是科学所说的那种与‘意见’相对立的狭义的‘客观事实’,根本不能从自然角度去定义它们。在涉及人类行为时,物只能是行动的人所认为的物。”^②主体赋予不一定对应物理事实,也有可能是观念性存在的非物理事实。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客观事实”至少包含三方面的要素:“一是行动或是思维的人,二是某种可欲的或想象中的效用,其三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品。”^③也就是说,对事实的认识需要将求知过程置于更自然的条件下,使用更多实质性的方法,借助更多的基础理论来进行分析,还必须将认识过程置于一种整体的关系(即语境关系)中,因为任何要素的变化都将波及整个研究的理论网络。

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确立了质性研究中主体参与的重要意义。任何研究都难以完全排除主观性的介入。质性研究既承认认识的局限性,也承认个人因素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社会现象具有价值性,需要把个人嵌入文化和社会情境,才能获得关于研究问题的科学认识。当然,这一过程产生的意义具有可变性和能动性,这也恰恰证明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认知的多样性。马克思曾指出:“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④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力量是一种历史范畴,一种不断生成的力量,这种力量又受现代工业发展水平制约。人们的认识能力受社会条件制约,科学研究不能脱离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没有一种方法具有永恒的普遍性,人类的理性逻辑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这也使质性研究逐渐摆脱了对理性确定性的膜拜,开始将事实与价值、情境与规范、理论与实践等的关系问题纳入自身的研究视野,从追求客观性转向了对主观性、主体性的关注。

(三)非客观本质的意向性获得

人们对于本质的探寻从未停止,从“本质是什么”的追问逐渐转向了“本质是否客观存在”的疑惑。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在重新界定本质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通向真理的新的哲学道路。

现象学仍然承认本质,但本质不是现象之外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可以被还原为现成实在的对象。本质“既不是一个普遍之物,也不是一个个体之物”^⑤。胡塞尔提出“本质居于现象之中”的逻辑立场,将对本质的探索追溯到了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之

① 姜永志:《理论心理学:历史与反思》,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第48页。

②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23页。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第83页。

⑤ 马克斯·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68页。

前,认为在意识的世界里,现象和本质是融合统一的。^① 只有通过意识的直观才能获取事物的本质,即本质直观。与经验总结和理性推理不同,现象学强调本质的获取是主体在“看向”现象时瞬间生成的直觉和“洞见”,与现象世界的相遇即与本质的相遇。事物如其存在一般显现,也如其显现一般存在。作为一种意识行为的结果,本质既不是纯粹心灵的产物,也不是人心灵之外的实际存在。“只有返回到直接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回到由直接直观得来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伟大哲学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②现象学虽然强调本质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但这种“客观”,并不是超越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质存在,而是相对于缺乏逻辑联系的主观臆断而言的。现象学追求纯粹的、决然自明的一般性本质,因此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应成为所有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面向事情本身”成为现象学认识本质的主要路径。这并不是简单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经验为对象的认识方式,而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是事物的观念性本质向主体的意识逐渐显现的过程。“现象”之“现”,即“显现”之意;“象”则为现实事物在观念中的意识表象。从看到什么到产生“洞见”,需要经过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等意识活动的综合作用。前者需要主体悬置对象存在的信念,从而还原到纯粹的现象和事物绝对的自身中;后者需要悬置认识主体在世界中存在的信念,即对意识存在的信念进行悬置,从而还原到先验的意识领域当中去,由此便实现了对事物本质纯粹的一般性认识。当然,作为一种观念活动,“洞见”的产生与主体特性有着直接关联,它们往往青睐那些有经验和积淀的研究者,因为这样的研究者在意向性的获得过程中具有更敏锐的想象和更深刻的直觉。

现象学所持真理观和研究范式与质性研究最为贴近。在质性研究者看来,本质就是一种主体意识活动所形成的具有客观意义的观念性成就,即需以“意识”为研究对象,通过意向性的本质直观获取事物的本质。这表明,将研究者作为工具不仅仅是用研究者的感官来获取资料,更是运用研究者的内在思维模式来获取社会事实和现象的一般性本质,以实现对社会世界的意义理解。这是主体“我”的一种特殊的意向性,是“我”的自由想象和主观经验构成的意识行为。因此,质性研究拒绝用绝对主义的客观标准来评价结果,强调主观解释的意义和价值。它不是去判断真假,而是在将研究者理解为“具体的人”的立场上,肯定每一个被研究的言说都是“主体真实的”,并在自身反思与理解中判断这些言说反映了这个主体的何种“真”。^③ 质性研究充分尊重主体的个体化构造,接受和包容个体的差异,通过研究者自身的意识结构和意向活动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深刻的、动态的理解与建构,得出具有逻辑性和解释性的研究结论。由此开始,质性研究明确了“诠释—理解”的研究主旨和范式,与量化研究的差异

① 叶晓玲、李艺:《现象学作为质性研究的哲学基础:本体论与认识论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年第1期。

② 倪梁康:《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意义——纪念现象学运动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③ 同①。

和对立也日益明显。

(四)非客观本质的建构性生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本质的认识越来越复杂。社会科学领域更加强调主观性因素,在否定客观本质的同时也否定了本质的先验性和确定性,本质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建构。正如尼采所说:“事实恰恰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解释。”^①

建构主义彻底消解了本质的确定性,认为真理和知识并不是从世界中被发现和识别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人们可以运用思维结构观察自然界,但最终是在人造的世界里实现对事物的理解,如政治、哲学、历史、法律以及数学等。这些知识的存在恰恰表明了人类的建构能力,也说明社会实在论所强调的客观基础并不存在,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描述建立于文化、符号和历史之间的互动。“人生产了实在,并在生产实在中也生产了自身……因此,‘被社会地建构的’世界也是辩证的。它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和‘自然’与‘人’之间。”^②辩证法是建构主义的核心,它既不期待发现事物的终极性本质,也不否定事物存在本质,只强调本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的真理是异质性的,是不同的思想和利益在互动过程中冲突、协商与达成共识的结果。保罗·恩斯特(Paul Ernest)提出:“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本体论的核心……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基本现实,就是商谈……商谈被看作是哲学的中心,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自不同的传统,其中包括米德、彼得斯(Peters)、罗蒂和伽达默尔。商谈就是一群人在一起使用共享的语言进行交谈。”^③协商、对话和共识是构建社会图景的主要方式,即在可共同理解的语境下,讨论、权衡、批判各种观点,以形成清晰的、有说服力的共识,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对话的方式寻求真理。

建构主义倡导的生成性、多元性的认识标准确立了质性研究的理解性准则。由于强调社会科学本质和真理的建构性,本质成为一种既非客观也非主观的关系性存在。从认识的角度看,“我们只可能判断某一个行为或一种想法是否达到了自己的预期,而无法知道它们是否‘真实’”^④。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逻辑来说明,对事实的认识来源于主体的解释和理解。这也成为质性研究的独特性和优势所在。正如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言:“理解就是通过人类历史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达到感官所不及的地方,由外在的客观实在去探究内在的精神世界,从而认识由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和历史的本质,即历史理性。”^⑤视域融合、阐释学循环、对话交流等都成为克服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局限的新的认知方式。通过具有包容性的主体间的开放、交流和反思,在自我与他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 Vintage, 1968), p. 267.

② Ralph Pettman, *Common Sense Constructivism, or 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1.

③ Paul Ernest, *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 162.

④ 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50页。

⑤ 王国席:《人文科学概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第174页。

人、个体与世界、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扩展自身描述和解释事物的认知结构和叙事话语。

总体来看,质性研究伴随着本体论、认识论的发展而产生。从本质的确定性到建构性,从认识的客观性到生成性,不同的哲学认识论互有矛盾,也互相依存。它们为质性研究提供了思维依据和理论基础,也赋予了质性研究在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下的研究张力和多种潜能。

二、质性研究的价值选择

质性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泛兴起,不仅仅源于研究者的学术偏好,更与社会力量的推动密不可分。科学化、标准化研究曾在政治权力的护翼下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宏大叙事建构出具有权威性的“元话语”体系,赋予逻辑中心的科学和社会知识合法性地位。随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这种宏大叙事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认识需求,研究者们开始审视未被关注的质性研究,并将其与社会的民主政治运动相联系。于是,在社会与价值层面,质性研究开始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成为质疑权威、追求社会公平的工具,也成为人们自我反思和自我解放的方法象征。

(一) 研究对象转换:从塔顶到后街

质性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从历史的宏大叙事走向了微观的主体经验。这可以看作后现代历史观影响下的社会科学转向,也是对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挑战和突破。

质性研究的微观群体视野可追溯至早期民族志研究。“民族志”一词最早是由坎普尔(Campbell)在1807年提出来的,即“对于民族的记述”。^①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致力于实现民族志的科学化,将实地调查的方法引进民族志研究。当时民族志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陌生世界的文化以增进对西方世界文化自身的了解。殖民者、传教士、探险家等带着种族优越性的思想烙印,怀着猎奇的研究兴趣和动机,对各地的奇风异俗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形成了民族志的雏形。伴随民族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独立,民族志研究开始强调进入研究对象的语言、行为和文化当中,关注其实际用途和背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用“在这里”“到过那里”“回到这里”的三阶段论来诠释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城市的亚文化群体;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族志研究越来越关注文化的接触、变迁与调适等问题,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殖民反思让民族志研究更多聚焦于落后或边缘的社会群体。

怎样去研究边缘或少数群体呢?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兴起促使人类学和社会学走向了合流。以怀特(William H. Whyte)的《街角社会》为例,从客位走向主位、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立场转换奠定了质性研究的基本范式。首先,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语境的熟悉;其次,是与研究对象进行参与性互动,让群体摆脱单纯被观察、被言说的境遇,成

^① 王海龙:《人类学入门——文化学理论的深层结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第46页。

为主动的参与者和互动者;最后,则是对研究对象的意义阐释和理解。这种源于个体的言说和理解是有意义的,社会学理论为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一方面,个体的行为和意义是在社会互动中创建出来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其《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符号互动论思想,强调心灵、自我和社会不是分离的结构,而是人际符号互动的过程。个体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创造出各种符号,并赋予其现实的意义。社会是自我与他人互动的产物,也是一个由人创造和使用的符号的总和,意义仅仅存在于关系之中。借助与他人的对话,人构造自己的身份和人格。这种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方法,凸显出个体的具体存在而非结构化或抽象化的概括,在将个人意义放大的同时,尊重并且关注个体内在的主观理论和意义建构。

另一方面,个体的日常行为是社会结构和规则建立的前提。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学提出了一种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即行为被有效组织起来的程序原则。他指出:“我所说的常人方法论指的是这样一种研究,把索引型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理性特征,视为日常生活中那些组织有序、富于技艺的实践的成就,而且是带有或然性的持续不断的成就。”^①常人方法学宣称,社会秩序不是行动者遵循预先确定的规范的产物,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场景条件,依赖自身努力达致的权宜性成就。规则是在行动之后对行动的描述和说明,是行动具有可说明性的源泉,而不是行动的指引。为探索社会互动的隐含规则,常人方法学主张运用实地观察、主观理解、语言分析等方式,甚至采取一种“打破常规”的技巧,引起人们对于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秩序的反思,寻找“常人”将日常现象转换为生活常识和习惯的意识机制,从而揭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客观化”面纱。“常人取向”继承了实用主义传统,让普通大众成为学术戏剧的主角,凸显了日常生活的实践性和主体的反思性,开辟了自我理解的醒悟之路。

(二) 研究思路拓展:从整合到分化

质性研究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方法体系,它像一把大伞,融合了多种形式,很难严格界定;又由于它更多关注微观经验和琐碎的社会现实,所以常常被规范严谨的理论研究忽视。然而,从本质来看,质性研究具有敏锐而深刻的特性,它试图打破宏大叙事的思维框架,用零碎的片段拼接社会的图景,从而洞悉社会文化实践的深层结构模式和意义机制。

在实证主义席卷自然科学获得重大成功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也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并试图寻找可预估、可把控的科学性和规律性。结构主义力图通过整体性和结构性的探索提供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性法则,成就社会科学的规范性特质。

结构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主要包括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文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它们共同指向的理论内涵是:人们所体验的活动只是某种深层

^① 刘博维:《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研究综述》,《学理论》2018年第6期。

结构的表层或表征,其可以为行动者所感知,并与行动者的意义相关联,但深层的文化模式才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意义。每个人的言语和行为都是自主行为,但又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在文学、经济、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流变中,都有一种历时性和共时性交叉的结构在发挥作用。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真正反映语言要义的规则是在复杂多变的言语现象背后制约着它们的共时的结构。这种规则为个体所执行,但却不受个体支配,它是系统的规则。“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①社会系统制约着人的思想意识,个体的思想和行动在历史的变化中总是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方面,受共时性的社会结构支配。研究者需要从表层探寻到深层,运用语言或文本分析,寻找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总的规律。质性研究也试图在这种总体性逻辑中找到解释社会“一般规律”的标准化理论框架。

然而,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基于逻辑的推演力量的整合主义仍然无法消除理论和事实的紧张。比如,用于结构分析的前提——文本本身的客观性是如何实现的?深层和表层的关系是否可以解构?整合主义不免具有理论上的乌托邦色彩,其本质上的逻辑中心主义也限制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多样性理解。鉴于此,一种解构主义的方法应运而生。解构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为代表。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既无力动摇现存制度和文化结构,也无法脱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于是他开始批评“结构”,反对逻辑的先验性和确定性。^②解构主义力图消解中心和本源,拆解牢固的形而上假定与预设,通过对语言的重新发现和解缚,揭示人存在的灵动意义和状态。解构主义还试图证明,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存在不断被否定的结果,需要用非存在的踪迹来填补,用意义的链条来排除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和对权威、理性的崇拜。受此影响,质性研究逐渐摒弃了对整合主义的信奉和执着,倡导运用解构的思维打破总体性结构的封闭性,以发现内在矛盾、颠覆原有秩序、改变或重组概念关系,重新确立被遗忘和边缘化的意义,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责任感和伦理使命。

20世纪中叶以来,复杂多变的政治事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不言自明的语境,从结构主义的盛行到解构主义的多元分化,社会理论的发展不断影响着质性研究的价值选择。一方面,质性研究尊重个人在世界中的独特体验和经历,积极拓展个人的思维和生活,寻找个体生成的意义体系;另一方面,它也致力于在个体建构中发展社会学的想象力,实现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对立性的超越。美国学者斯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和科尔滨(Juliet M. Corbin)将质性研究中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描述为“个人生活,生命体验,行为,情绪(emotion),情感(feeling),以及组织功能,社会运动,文化现象等”^③。在这一过程中,质性研究不断地解构理性、权威和确定性,以多元、包容的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5页。

② 王向峰:《从结构主义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③ 余东升:《质性研究:教育研究的人文学范式》,《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7期。

方式释放着研究主体的意志扩张力,使其深刻理解文化结构和秩序的局限性,并通过自我的重构走向更高阶段。

(三) 研究目标深化:从表达到解放

质性研究的表达过程既是主体向世界的敞开,也是一种隐秘的情感释放和意义生成。通过研究对象的自我表达,引发其对自身不利处境的警醒,进而采取行动进行改变,是质性研究的反思性吁求。在社会意义上,质性研究成为一种追求正义、具有“解放”意蕴的事业。

语言是主体自我表达和反思的重要方式。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将语境或语言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不仅确立了法则的权威性,也使解释者本身的主体地位得以显现。语言是主体意识的体现,通过具象的方式来表达主体的认知和理解,进而扩散这种理解。语言的运用是个人对世界的体认,展现了主体从认识存在者到认识存在本身的过程,这必然也是一种社会的乃至政治的权力的体现。解释学孕育着反思的意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指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保守性,即过于关注文本、前见和传统之间的可证实关系,而忽视了解释可能产生的对传统的反思和质疑。他认为,真正的诠释或表达应当促成自我反思,反思具有解放的作用,能够揭示未被意识到的暴力和压迫,从而使主体摆脱对控制力的依赖。^① 质性研究也希望通过对个体语言符号的深层阐释,捕捉人们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行为,并以此作为理解的基础,促成个体的觉察、省思和解放。

批判性是质性研究走向深入的思维品性。批判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事物的本质是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实现的。批判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方法的批判,即反对实证主义对于社会世界的被动应对以及科学用来描述社会的“自然法则”的观点,认为实证主义只能证实已经存在的事物,却不相信超越的可能,更无法证实未来或理想;二是对社会现象本质的逻辑思维的怀疑,也即黑格尔意义上的批判,强调反省社会和历史中的人为束缚。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批判理论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重点揭示了人类的启蒙和文明进步是怎样转向了它的反面,即把人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了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与“统治和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从而确立了把人从社会现实中解放出来的基本理论宗旨。哈贝马斯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人文科学研究的解放旨趣,认为它“具有一种推论出来的性质”^②,超越了技术旨趣和实践旨趣。这也深度契合了质性研究的人文属性和价值内核,促使人们对研究的伦理关系展开系统性反思。人文世界是由主客体构成的价值世界,既有促成理解、达成共识的需要与兴趣,也有摆脱束缚、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内在诉求。此外,女性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基于女性立场和女性经验的批判方式。在对抗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的同时,女性主义将研究者放在批判的平面上,认为研究者不应该以匿名和权威的声音出现,而应作为具有特定欲望和利益的、真实的、历史的个体出现在研究中,要重塑研究关系,反

① 牛文君:《诠释学与社会科学的逻辑——重思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之争》,《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②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28页。

思传统研究关系中的束缚和压迫。

从语言解释的反思性,到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的解放功能,质性研究蕴含的自我觉醒意识也逐渐清晰和强烈。研究者深刻认识到,研究、表达与写作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自由,而是权力、阶层、性别和种族的反映。话语与权力紧密联系,人们的行动受到话语的塑造和影响。话语是人们认知体系的镜像,认知的局限性带来了知识的垄断,也即知识的权力。不同的话语体系实质上是权力的等级和差异的体现。质性研究也深陷“表达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对文本创造能否捕捉人们“生活着的经历”的质疑,更是对于谁有权力来言说、解释和评价的权力争夺。面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碎片化、孤岛化的存在,质性研究不再执着“元叙事”和“元神话”,固守特定的言说方式,而是以审慎的态度反思文本,以兼容并包的理念鼓励、尊重并承认主体的个体化、差异化表达,彰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关怀本性。

三、质性研究的实践旨趣

在实践中,质性研究表现为多种类型,如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纷繁的形式背后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即对经验的重视、对过程和意义双重属性的关注以及对理论建构和智识贡献的追求。

(一) 经验质料

当哲学从存在者转向存在本身,经验就从工具意义转向本体地位,科学哲学从经验的“形式研究”转向经验的“质性研究”,即研究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解释其所处的世界以及身在其中的经历和体验。狄尔泰曾强调:“现实仅仅存在于由内部经验所赋予给我们的意识的事实中。”^①

质性研究中经验的内涵与传统哲学中经验的内涵并不相同。后者将经验视为纯粹感觉或知觉,是逻辑的质料,是静态的、尚待结构化的概念。由于不具备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稳定性,经验常常无法直接成为研究的对象。在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经验概念中先后引入了时间、语言文化、情感信念、身体、环境等因素,使其成为历史的、动态的、建构的过程。^② 经验概念的重塑扩大了研究的视角和范围,经验的超越性维度被引申出来,经验哲学成为一种关于生成、转化以及关系、构造、意义与价值的学说。这让质性研究的经验取向兼具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

一方面,经验取向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然和全面的还原,反对实证主义的决定论和化约论。质性研究者认为,社会世界是人们的经验世界,经验世界的事实往往是隐蔽的,并不能通过无偏差的科学观察和测量获知全部,各因素之间的作用 and 影响也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获取。经验是联系人与世界的重要纽带,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也代表着完整的世界。在杜威看来,经验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

^① 陈向明、朱晓阳、赵旭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第60页。

^② 金梦兰:《科学的经验与经验的科学——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概念的重构》,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第234页。

植根于自然这一现实基础的。这里的自然是指社会世界的原初性和完整性,“自然包括石块、植物、疾病、社会环境、享受和苦难”^①。人所经验的自然,既有变动不居和悬而未决的动态性,也具有确定无疑的稳定性,这种复杂性是实证研究无法捕捉的。同时,经验也不是抽象的,它代表着人们所处的由事物、观念、希望、恐惧和志向组成的世界。^②这表明每一个经验都蕴含着独特的情境,只能通过实践行动来进行经验的研究。深度访谈、现场观察、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对经验完整性和关系性的还原,是坚持整体性的认识原则而展开的社会现象研究。

另一方面,经验取向也决定着如何实现文化的体验和理解,即意识如何接纳并理解事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指出:“我们的经验不仅仅是言语的,而且还有表象和印象。作为社会科学家,长久以来,我们过于看重言语而忽视了视觉,看重语言而忽视了表象。那么作为思想和欲望,作为词语和表象,生活的经验是首要的事实。”^③从人类学角度看,经验的存在显然要更具直接性和真实性。它不仅是个体的意识和行为,也是文化概念形成的基础,更是质性研究不可或缺的解释来源和理解依据。文化作为心灵与世界互动共塑的过程,是一种偶然的链接而非决定的必然。对于文化意义的探寻,不能完全从社会既有的象征体系中寻找。正如丹·司波博(Dan Sperber)所说:“要成为一种文化的意义必须要经过个体认知加工的转化而成为个体内部的表征,最终我们能够理解的仅仅是这些个体化的内部表征。”^④这些内部表征即为个体的经验,它审慎地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拥有自身的经验而无法介入他人的经验,但我们可以与他人共享经验。在经验的共享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文化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能够解释我们如何知道这些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二) 情境分析

社会科学的分析逻辑大致从两点出发:一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社会的复杂多变和文化的多样性瓦解了人们所熟悉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让文化的阐释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在以前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认为知道,什么和什么协调以及什么和什么不协调……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可以处理特殊性、个性、古怪性、不连贯性、反差和奇特性,对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深度多样性’——一种归属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多元性——做出回应。”^⑤因此,要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必然需要结合现实的情境。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了框架理论作为解释的模型。所谓框架,就是个体产生现实感的诸条件以及“个体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时刻所具有的经验结构”^⑥。框架能够帮助人们感知、定位、辨别以及标识社会事件与信息,以框架为基本要素的情境分析在于分离出个体界定社会情境并重构真

① 霍华德·A.奥兹门:《教育的哲学基础》,石中英、邓敏娜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第146页。

② 同上。

③ 陈向明、朱晓阳、赵旭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第60页。

④ 同上书,第64页。

⑤ 伍威·弗里克:《质性研究导引》,孙进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第357页。

⑥ 王晴锋:《框架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实、解释辩护的基本结构。作为理解经验的工具,情境分析促使个体将经验组织化为富有意义的活动。

一方面,情境分析是形成质性研究“因果性说明”的必要条件。因果关系究竟是客观存在的法则,还是主观感知的幻象?这一哲学史上的伟大交锋展现出人类独有且重要的逻辑能力。休谟曾指出:“因果被人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经验,但又不是仅凭经验。”^①他否认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认为一切现实事物的关系都不具有必然性,有可能只是偶然的习惯。康德则认为,因果关系判断是人们运用知性范畴把握经验现象的客观化结果。^②虽然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推翻了休谟的怀疑论,但是关于因果必然性的疑问却一直存在。在复杂的社会世界中,以完全归纳法来总结普遍规律是难以实现的,演绎法同样由于前提的预设而无法增加研究的丰富性。一种理解性的分析,即寻求最佳解释的分析法——溯因法,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其代表人物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当事实与预期不符时,我们就需要做出解释的话,那么这个解释就必须是一个能够在特定环境下预测所观察事实(或必然的,抑或非常可能的结果)的命题。这个由事实驱动的采纳假设的过程,就是我所说的溯因推理。”^③溯因推理的触发点是事实与预期不符,这就需要研究者基于田野工作的想象力,通过好奇心、直觉、经验以及猜测等心理特征驱动,在鲜活的社会生活世界发现惊异的社会事件。这种惊异或来自经验的局限性,或源于对日常生活的忽视,由于未能形成令人信服的现成解释,只能迫使研究者回归到情境之中寻找原因,展开对经验事实的推理过程并形成最佳解释。

另一方面,情景分析是促成质性研究“解释性理解”的重要途径。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首先将解释学从文本解释拓展到了心理解释。他认为,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背景、语言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普遍性的误解,因而需要将读者的主观性确立为理解活动的要素,重构一种基于逻辑连贯性和情境整体性的历史理解。伽达默尔指出:“理解永远是从整体理解(解释的前理解)运动到部分(传统之一部分)又回到整体的理解。”^④其中,解释的前理解代表着人们理解事物之前所具有的前知、前见或偏见,传统则意味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知识和思维范式。主体从历史传统中继承精神要素,再去理解整个传统,这就是从部分去理解整体、从有限去理解无限的解释路径。整体和部分是无法同时被发现的,只能在不断的互文解释中实现,而且要在解释者的视域内统一,从而实现真正的理解。解释的循环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理解无法一次完成,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不是机械的或抽象的理性过程,而是包含着直觉、顿悟等非理性因素的深度参与。从更广阔的关系来看,“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还可以引申为“中心与上下文”或“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外围是一个无穷的概

① 李磊:《休谟怀疑论哲学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② 朱耀桦:《康德哲学中的溯因思想研究》,《文化学刊》2018年第10期。

③ 徐慈华、李恒威:《溯因推理与科学隐喻》,《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

④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New York:Seabury Press, 1975), p. 259.

念,可以从个体的经验扩大到整个世界史。正如狄尔泰所指出的,生命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历史中的上下文关系以及语言中的字词句的关系具有同构性。^① 这就是说,对任何文本与事件的理解,都要将其视为作者或主体的生命和生活瞬间,并还原到当时历史背景或历史上下文的关系之中,最终在整体与部分的复杂关系中形成合乎逻辑的分析结论。

(三)理论建构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一个新的经验现象被发现,它的重要性只能通过参考对已有的知识体系或‘理论’的贡献而得到判定”^②。就质性研究而言,它的理论旨趣不诉诸绝对的抽象,也不沉湎于田野拾遗,而是着眼于中观的理论建构。其特征表现为:一是理论生成的经验性;二是理论解释的相对性,三是理论发展的可修正性。这表明质性研究理论具有时空属性,既重视概念产生的连续性,也注重概念解释和应用的边界与情境,同时注重理论的未来指向和发展变化。这正是理论验证和理论推论的前提,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强调的,“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③。

面对原始的杂多个案,质性研究要怎样进行理论建构呢?扎根理论是理论概括的重要方式。扎根理论最早由格拉斯(Barney Glaser)和斯特劳斯两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④ 分析归纳法是其主要的方法,即在繁杂的经验个案中寻找内在的定义、范畴以及逻辑联系,将其上升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社会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式,是在经验证据的支持下,寻找核心概念,并以核心概念统领相关概念、范畴,建立逻辑体系,最终形成反映事物本质的理论的过程。为了避免归纳逻辑陷于对经验材料的忠实而缺乏学理性和抽象性,质性研究的理论构建需要深度的自省。

一方面,深入扎根过程,通过反观来确定概念的恰切性,而不是急于套用相关的理论。扎根理论最初并不追求形式化的理论表述,而在于呈现经验的特殊性,依靠“异域见闻”所提供的概念本身就能促成一种理论反观和文化多样性的推论。“以当地人视角看事情”并进行扎实的叙写,不仅展现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近经验”和“远经验”之间的灵活关系,还能向理解者提供更多的符号,促使理解者的意义范畴不断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形成是简单易行的。正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文化解释使其理论发展格外困难,因为它要求理论始终要与其基础保持紧密联系,而不是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强调寻求抽象的规律。”^⑤经验世界的图式是“发现”,是以实在物为前提的,如实践、语言、文化、利益等,脱离了这些实在,知识和观念的生产将无法实现。然而,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方面,经验又并非唯一来源,人们的精神和价值活动既可能

① 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61-62页。

② 王富伟:《质性研究的推论策略:概括与推广》,《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1期。

③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第196页。

④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第327页。

⑤ 朱林、张莉:《深描与衍义:格尔茨的符号人类学解读》,《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与其生活经验相关,也可能并无关联。意识制造的价值原则、思想体系等方面的差异,会表现为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偏好和心理特征,这些都会带来经验解释的障碍,需要运用社会实践的逻辑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另一方面,延申个体案例,发展整体性理论。延伸性是社会科学理论实现整体性原则的重要策略。对质性研究而言,搜寻的“事实”必须放置于社会—文化的整体背景中,也必须放置于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历史联系之中才能被认可,必须以质疑和超越现有规范的信念为动力才能想象并创造理论。研究者要从理论需求的角度拓展个案范围和个案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整体性的概括。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将“如何扩展”细化为四个维度:(1)从观察者扩展到参与者,即研究者不仅是一个观察者,而且是一个能给研究情境带来影响的参与者;(2)从时空上扩展观察,是指要将观察的范围从当前的个案时空拓展到历史脉络和社会空间上;(3)从过程扩展到结构,是指要观察到实践具体过程背后的宏观力量;(4)扩展理论,对以上三个维度的扩展都需要借助理论,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案重建既有理论。^①研究者通过扩展个案的策略,建构具有整体性的关联要素,概括要素之间的动态生成关系,并展开理论对话,从而生成一种基于情境条件的适度理论。其中,独特的或关键的个案以及反例,提供了归纳的类属和维度,促进了理论的饱和性与自洽性。当分析归纳所解释的经验个案突破了理论的核心假定,就需要创建新的理论模型,产生新的知识增长模式,即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说的“范式”革命,一种创新的、实质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就由此产生。

从经验出发,通过情境分析,建立经验之间的联系,形成具有一定抽象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是质性研究的实践理性。纯粹经验性的描述或许能够增加人们的经验知识以及对未知事实的了解,但是,寻找事物背后的“一般”并在人们已有的存量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仍然是研究的重要目的。从这一点来说,规范的质性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杨孟葳;责任校对:杨孟葳】

^① 王富伟:《质性研究的推论策略:概括与推广》,《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1期。

ment preferences on micro-enterprises. It reveals three key insights: first, local governments had obvious investment preferences prior to 2013,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adjusted after 2013. Second, the adjustment of investment preferences has improved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through three critical mechanisms: the investment-consumption structure, enterprise operational autonomy, and market integration. Third, the adjustment of investment preferences did increase financial pressure, but it did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essure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was a feasible way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stable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he focus of local governments' policies for stable economic growth should shift from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to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and resolutely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giving priority to stabilizing and expanding consumption in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pay attention to promoting stabl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n effective market; maintain an appropriate investment scale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Key words: official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vestment preferences;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investment-consumption structure

Audit Auality and Fir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Dual Perspective of Scale and Quality (By WANG Yiqin, YANG Siyi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view is that high-quality external audi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 and alleviat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external audit quality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and its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scale and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audit quality not only promotes the increas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output but also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 series of endogeneity tests and robustness tests confirmed this conclusion.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higher audit quality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romote positive news media coverage, thu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atent outpu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for enterprises with few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udit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scale of innovation output. while for enterprises with high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nnovation scal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is not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on innovation quality does not have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firms.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quality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Key words: audit quality;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novation scale; innovation quality; innovation effect

Four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that Need to be Grasped in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YANG Ting, CHEN Bo)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Marxist theory and history. In-depth research will help to elev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rther enhance the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consensus of the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istory is not simply a vertical extension of time, but also a horizontal expansion of spac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quires grasping four pairs of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in three dimensions on the basis of mastering its basic context and development clues: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at the macro level;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heory, truth-seeking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at the meso level;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tail research and overall research at the micro level. This will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from general history to specialized history, from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historical speculation, and from theoretical spontaneity to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the CP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theory; seeking truth and applying it in practice; the whole and the details

The Form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pistemological Evoluti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Pursuit (By WANG Xia)

Abstract: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n social science but also a methodology grounded in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rough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various social theories, it has shaped its own intellectual landscape and research norms. In response to differing ontologies of objective and non-objective essences, qualitative research has developed distinct mode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centered on discovery, non-rational engagement, intentional attainment, and self-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pistemology. In the close connection with social movement and social theory, it demonstrates a value orientation emphasizing micro-level group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deconstruction of authority, and pursuit of liberation. Practically, it demonstrates a normative focus manifested through empirical orientation, con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stantive theories.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epistemological evolution; value orientation; practical pursuit